

陶门弟子 教育家

孙丹年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孙铭勋

贵州省教育史志办公室——史志研究专题著述

2



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

孙丹年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孙丹年著. -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0650-895-4

I. 陶… II. 孙… III. 孙铭勋(1905~1961)-传记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5624号

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

孙丹年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18号A栋

(电话 8654672 邮编 550003)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字数 16.75印张 400千字

版次印次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0-895-4/K·22 定价: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新添大道测绘院 电话:6300007 邮编:550018

序一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向贵州籍的著名平民教育家孙铭勋学习

孔令中

《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是其女儿孙丹年编著的。本书饱含激情,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孙铭勋如何从边远的贵州,到当时的首都南京投考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学校,成为陶门弟子,从此长期追随陶行知进行教育改革,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历程。1927年,孙铭勋和戴自俺准备投考晓庄师范时,曾给陶先生写过一封信,陶先生亲自给他们的回信中说:“晓庄学校开办已快一年,贵州的同志一个还没有”,因此对他们准备投考晓庄“极表欢迎”。并说“如果将来乡村教育有到贵州的一天,两位便是第一位使者。”他们没有辜负陶先生的期望,后来都成为陶先生的得力助手,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贵州和全国传播,作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孙铭勋不但是一个教育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先后在广西、延安、甘肃、重庆、贵州等地,一面在学校从教,一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按照党的指示在陶行知先生身边工作,协助陶行知先生创办重庆育才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育才学校迁回上海,他担任该校重庆分部主任(校长)。1946年陶行知先生逝世后,重庆育才学校处境十分困难,他面对学校经费来源断绝,国民党政府加紧迫害的情况,团结全校师生,千方百计把这所学校维持下来,直至重庆解放。解放后,作为一位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和老共产党员,他本可步入仕

途,享受较好的待遇,但他却弃政从教,始终坚持继承和维护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想。因此,在1951年批判“武训传”的政治风波中被列为代表人物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批判,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又被划为“右派”,不但身心备受摧残,家属也受到牵连,最后于1961年不幸英年早逝。纵观孙铭勋的一生,可以说真正做到了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孙铭勋足迹遍及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既是教师,又是管理人员。他对教育科学的各个领域如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管理、教育方法,以及课程教材均有所涉及,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对乡村和工厂幼儿教育的研究。

在中国,男士从事幼儿教育的很少,能称为“家”的更为鲜见,而孙铭勋和戴自俺却选择幼儿教育事业,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晓庄师范学习期间,他们就在幼教前辈专家陈鹤琴等人创办的燕子矶幼稚园和晓庄幼稚园工作。稍后他们二人创办迈皋桥幼稚园。这3所幼稚园都是中国最早的乡村幼稚园。1932年,孙铭勋到江苏淮安创办新安幼稚园。1934年,孙铭勋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个劳工幼稚园。当年,国民政府确定每年4月4日为儿童节,并称当年为“儿童年”。陶行知先生在《生活教育》杂志发表致孙铭勋、戴自俺的信,对此一创举作了极高评价,认为这是为“中国第一个儿童节办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后来,孙铭勋又到广西南宁教育学院任幼稚师范班主任。1955年在身陷逆境的情况下,还在西南师范学院创建儿童文学专业科,并从事儿童文学的教学、创作和研究。他关于幼稚教育的著作主要有《幼稚教育》、《晓庄幼稚教育》、《儿童节教学做》、《古庙活菩萨》、《晓庄批判》、《乡村幼稚教育经验谈》、《劳工幼儿团》、《幼稚教育论文集》、《论幼稚教育》(其中有几部与戴自俺合著)等。在儿童文学方面著有《儿童文学讲义》、《儿童文学论文选读》、《幼儿园朗诵诗歌》、《儿童谜语集》、《四川儿歌》等。

孙铭勋的幼稚教育实践,是在其恩师陶行知的指导下进行的。他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具体运用到幼儿教育,并使这一理论有所发展。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1. 强调幼稚教育的普及,特别在农民子弟中普及。他和戴自俺在晓庄师范读书时,就提出把晓庄各幼稚园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学院的提案,并强调“其着眼点并不只在晓庄一个学院之成立”,而是“乡村幼稚事业之奠基”,“要将这种意见介绍到全中国全人类的教育界去”。这一提案经过激烈辩论,最后得到陶先生赞同。1934年,他和戴自俺为创办中国第一个劳工幼稚园,并在《生活教育》杂志发表宣言,阐述创办劳工幼稚园的宗旨。宣言指出,虽然有了儿童节,但广大的农民子女和工人子女并没有真正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幼稚教育,主要是为那些达官贵人的子女办的,因此他们大力倡导办为工人农民子女服务的幼稚园。为体现这一思想,他举办的幼稚园,都十分强调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方便工人农民子女入学。2. 他根据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提出,幼儿的生活即是幼儿的教育,他认为只有幼儿的生活,才是幼稚教育的内容,脱离幼儿的生活,或者是成人的生活,不能拿来。他还认为生活是广泛的,教育的范围就是生活的范围,不只是在教室才能进行教育,在家庭中,在大自然中,都可以对儿童进行教育。他强调应按照生活教育的五个目标对儿童进行教育。即用健康的生活施以健康的教育;用劳动的生活施以劳动教育;用科学的生活施以科学教育;用艺术的生活施以艺术教育;用改造社会的生活施以改造社会的教育。这五种教育中,健康教育是首要的。他还提出对儿童进行合理的生活教育,养成合理的生活习惯,这已超出了五个目标,但正符合幼儿生活的特点,是十分重要的。3. 打破幼稚园房屋教室的限制,把幼儿带到大自然去进行教育。同时,还打破幼稚园上课的时间规定和刻板的上课形式。这不但体现了“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思想,也符合当前流行的新教育观。4. 要求幼儿教师的素质须达到:具慈

母的心肠,尽妈妈的责任。要有小孩的天真,医生的本领,艺术家的修养,科学家的头脑,要负杂役的职务。还强调幼儿教师要注意锻炼自己,要使爱充满幼儿园,要注意观察儿童,对儿童的态度要庄严、和蔼,要随时注意自己和儿童的清洁,要注意研究小朋友的个性,训练小朋友的习惯。对于上述要求,孙铭勋本人首先作到身体力行,堪作表率。所以师生都称呼他为“孙妈妈”,直到重庆育才中学也是如此。此外,他对幼稚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也有十分精辟的论述。

无论作为革命者,或是作为教育家,孙铭勋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由于历史原因,这位贵州籍的教育家,长期在贵州默默无闻。《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一书的出版,使全省教育工作者有机会了解和认识这位教育家,为我们提供了一本向这位前辈学习的极为珍贵的教材。

注:孔令中,贵州省教育厅厅长

序二

一个道地的生活教育者：孙妈妈

胡晓风 金成林

孙铭勋(1905 - 1961)离开人世已经四十五年了。他跟随陶行知(1893 - 1946)从事生活教育运动屡试屡验、屡屡创造而又屡遭厄运长达三十四年,占其人生的60%。对这个人生转折之始,他曾有以下描述:

跋涉在人生的沙砾道上,一切已失了信仰,失了归宿,失了安慰。好像在这至大无外的世界,几乎没有我安身之处。……我又何尝不想突破这心的围墙,使赤烈烈的血潮,冲破这道上的重重厄障!然而乌天黑地弄得我头晕眼花,简直无路可走。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忽而遇着了晓庄,她的体态的轻盈,容貌的娇妍,实在给我以无穷的安慰。于是我重新得到了信仰,得到了归宿,我就与她谈上恋爱,更进而订下白头之约。但是同时,横逆的事件,也相逼而来,前面的诱惑,旁边的冷笑,后面的威迫,几乎随时随地,都要使我与她离异。然而她之对于我,又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力量。所以我依然是不能离开她。^①

这是转折的真实写照。三十四年来,他认真履行他订下的白

头之约,他从未与生活教育离异,他和方与严(1889-1969)是从未离开生活教育一步的晓庄学生。方与严活得久些,他从事生活教育运动长达四十二年。他是1927年10月10日到校的晓庄第二期学生。陶校长10月13日返校。孙铭勋、戴自俺(1909-1994)也来到晓庄。第二期招考时间已过,他俩只有等到来年第三期的招考。此时晓庄已有十四五省的学生,惟独没有贵州的。陶校长称赞他俩有志气、肯下乡,他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办法,叫做“长期参观”,就是说,可以先到这儿住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半年,都可以。住一段以后,你觉得可以,再考;不愿意进我们学校,你可以走,可以不考。^②

凡应试者必先立下从事乡村教育的志向。不同意者可不考不入校。为让应试者了解乡村教育,特在校内五里牌坊到校门口一里多长的地方,竖起四十块大标语牌,即《我们的信条》18条^③,乡村教育标语7条^④和晓庄新加标语15条^⑤,以供大家参考。孙铭勋对“三民主义教学做”和“教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做皇帝”这两条标语特有兴趣。原来他和陶校长、方与严一样,都是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⑥的同志。孙铭勋当即立下从事乡村教育大志,但心想若有机会,仍愿干政治,如做县知事一类职务,以谋乡村教育之发展。10月25日即直接向陶校长请教。陶说:“我愿你做政治家,不愿你做政客。”师生俩并就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详细的讨论了一番。他俩以“存心”、“动机”、“进退”、“目光”、“目的”、“主张”六个方面作了区分。还提到“政治家以‘正’为家,政客是‘正’客……政客只怕天下不乱,政治家一心只求天下治平”这两方面。最后陶校长在宴会上表示:“我愿大家做一村的政治家,不愿大家做一村的政客。”^⑦12月,孙铭勋就随着陶

校长和美术指导员许士骐(1901~1990),带着晓庄民众教育研究会出版之《军人千字课》去开封冯玉祥(1882~1948)部队驻地开展平民教育。孙铭勋深为陶校长的民主作风所感动。1928年2月参加考试后就成为晓庄第三期的正式学生了。结业后即开始从事幼稚教育。他和戴自俺一起,和陶行知、陈鹤琴(1892~1982)、张宗麟(1899~1976)、徐世璧(1897~?)、王荆璞(1905~?)共同创立了幼稚教育的生活教育流派。这七位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幼稚教育者十二人中占58%^⑧。这七位组成的团队为师生三代:

第一代是陶行知和陈鹤琴。他俩于1914年8月15日同乘中国自制的中国号邮轮去美国留学并于1917年、1919年先后回国。回国后又同在南京高等学校共事,共倡新教育,共同创立中华教育改进社。1922年陈鹤琴发表《语体文应用字汇》成为陶行知编写《平民千字课》的依据。1922年陈鹤琴专注儿童心理学研究,1923年陈鹤琴在家里办起南京鼓楼幼稚园,自任园长。1925年陈又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办实验性质的鼓楼幼儿园,成为中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1926年陶行知以社会学视野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⑨,进而提出“工厂和农村是幼稚园可以发现的新大陆。”^⑩1927年3月,陈鹤琴担任晓庄幼稚师范院院长兼指导员,把鼓楼幼儿园实验经验引入晓庄,并于10月在晓庄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他俩共同经历了生活教育的前两波试验,第一波是晓庄学校和淮安新安小学。第二波是工学团和新安旅行团。1934年在上海沪西办有中国第一个劳工幼儿团,同时在上海大场余庆桥孟家木桥办有乡村幼儿团。抗战以后,陶在重庆,陈在江西。陶仍进行生活教育的第三波试验: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陈以国立幼稚师范(江西泰和)为基地,创立了幼稚教育的活教育流派。他们是生活教育的元勋,也是中国幼稚教育的开拓者。

第二代是张宗麟和两员女将徐世璧和王荆璞。张宗麟于1921年秋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是陶、陈的得意门生。

1925年在改名为东南大学的教育系毕业,后成为陈的助手,协助办南京鼓楼幼稚园。1927年3月随陈兼任晓庄幼稚师范指导员。1928年上半年又调到晓庄任指导员和相当于教导主任的指导部主任,为晓庄学校的实际主持人,负责通盘筹划生活教育运动中的幼稚教育和乡村教育。晓庄被封后,张遭通缉,随陶撤到上海。方与严留校筹划善后后回到上海接替照顾陶行知,张又去福建、广西、重庆、湖北等四处奔波,终难安定。后来奉陶指示和杨效春(1899-1938)、潘一尘三人一道去山东支援梁漱溟搞乡村教育。1936年回上海主持生活教育社工作,直到1943年撤退去延安。曾担任过延安大学教育研究室主任。解放以后一直在北京从事教育行政工作。随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和诸多陶门弟子一样,他们都没有可能再关注生活教育了。徐世璧、王荆璞同是江苏一女师幼稚师范愿意下乡的两位毕业生,她们两位是晓庄幼稚教育的元老,是晓庄最早的两位女指导员。王荆璞还和张宗麟结成终身伴侣。

第三代即是孙铭勋和戴自俺了。他俩同是前五位老师的学生,同是中国幼稚园最早的男性园丁。同是贵阳师范学校的学生,同入晓庄、同时从事幼稚教育。

晓庄幼稚师范院培养的学生据1930年保存的同学录中有30位女生^⑩。这个材料是1937年事后报的。因政治问题暴露的学生都删除了。还有不计其数的“艺友”也未列入。其中男生因不符合当时教育法规也未列入。

幼稚教育的生活教育流派的这七位是三代师生关系,这种关系一般也可包括在血缘性伦理关系之中。有人说:“师生与同学关系在传统伦理社会中,往往是血缘性的意识化。”^⑪毫无疑问,生活教育运动中的幼稚教育即是这种血缘性意识的结晶、这种血缘性在学术上的渊源。这支队伍的地缘性与血缘性相比,稍逊色。七人中有五人属华东沿海皖、浙(各二人)、闽(一人),共占

71.6%,另两人跨越地缘性属西南边陲的贵州省,占28.4%,三分天下有其一。指导员中还有第四长者黄齐生(1879~1946),他是贵州省的老教育家,当然他不是搞幼稚教育的。在上述名单中可再也找不出第四位贵州人了。这也是贵州对生活教育的贡献。血缘性和地缘性都是业缘性得以发挥作用的两个重要因素。由于缺乏强势力量的依托和支持,业缘功能难以显现、难以施展。由于受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株连,生活教育三波试验的成果连同幼稚教育的辉煌一并被革命洪流淹没了。

幼稚教育的发展不过二百来年的历史,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发现了儿童,教育者才注意到受教育者的地位”^⑬。他是儿童教育的鼻祖。他写的《爱弥儿》(Emile),正是幼稚教育的萌芽。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oham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第一次将“生活教育”列为教育术语并有专门一节论述^⑭。他主张在慈母怀抱里用爱来教育儿童。陶行知曾被誉为“中国的裴斯泰洛齐”^⑮。裴斯泰洛齐所办学校学生限于六岁以上的儿童。1816年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招收六岁以下儿童的不同的所谓“第一幼稚园”。一个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创办的“性格形成新学园”(New Institution)。他是英国苏格兰新拉纳克(New Lanark)大棉纺厂的股东兼经理,他把2520人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恩格斯(1820~1895)说:“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⑯“1816年,欧文在新拉纳克创办一所幼儿园,儿童在这里不同书本子打交道,而去认识日常生活事物。……1824年到了美国……他在印地安纳州买下三万亩土地和地面上的建筑物,建立了‘新和谐(New Harmony)公社’,实现他建立

合作新村的计划,一直到1829年。”^{①7}他为工业社会创造了“企业即社会”的局部试验图景。由于他获得了空想社会主义名家的美名,因而正统的教育学家都有意忘掉了这个第一幼稚园的发明和存在。

现在正统的教育史上讲的是另一个“第一个幼稚园”。也是1816年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eber, 1782~1852)办的一所学校,只有三间茅屋,五个儿童。当时不采用幼稚园(Kindergarten)之名。他曾就教于裴斯泰洛齐。“从福禄贝尔发明幼稚园以来,世人渐渐觉得幼儿教育之重要;从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意大利女教育家)毕生研究幼儿教育以来,世人渐渐的觉得幼稚园之效力……世人乃渐渐的觉得幼儿教育实为人生的基础,不可不趁早给他建立得稳。”^{①8}蒙台梭利于“1907年震动全球的儿童院(Gasadei Bambim)出现了,收三岁以上六岁以下的儿童,用她所发明的低能儿的方法来教育。”^{①9}这比福禄贝尔的幼儿学校晚了91年。这说明幼稚教育从萌芽、发明到发展,是十分缓慢的。中国直到1916年教育法规上才有幼儿园之名,这比世界两个“第一幼稚园”相隔整整一百年。1926年陶行知提出创设乡村幼稚园,就要改革三种弊病,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把富贵的幼稚园化成平民的幼稚园。他和欧文、福禄贝尔一样,必须开始幼稚园的下乡运动和进厂运动,这是把工厂、农村变成大学堂即“社会即学校”的起点。陈鹤琴和蒙台梭利一样,则把幼稚教育建立在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两者融合乃是幼稚教育以及生活教育的起始。这七位组成的幼稚教育之生活教育流派是业缘性最强效果最为显著的学术团队。

1929年孙铭勋主持晓庄幼稚园已初见成效时,晓庄有两件事情特别值得一提。一是10月1日蟠桃学园成立。二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方法论专家、即设计教学法的发明者克伯屈教授(Wil-

liam Heard Kilpatrick, 1871 ~ 1965) 专程访问晓庄。

蟠桃园是把各幼稚园集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1929年7月8日,晓庄全体会议决定将晓庄的全部事业分设和平、万寿、晓庄(含晓庄幼稚园)、吉祥(含燕子矶幼稚园)、三元五个分院。分院以后,管理紊乱仍未解决,陶、张准备召开五院联席会磋商,孙铭勋、戴自俺两人提交“把各幼稚园集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提案,意在加强对幼稚教育的专门研究。由于分歧较大,多数人捉摸难定,提案人四处游说,9月28日会后,纠缠陶校长至晚上12点,29日清晨又谈。陶始终耐心倾听,一面思考一面相互辩论。后又召开全体会议整天讨论。陶最后总结发言,他讲了自己对提案有想得通与不通的两个方面,他碰到灵与理的矛盾,他提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幼稚学院可以单独成立,主要对各幼稚园负指导的责任,但不必集合一地,仍由五院灵活处理。总之本着办法“是可以伸缩的,是有充分的自由性的。”^②提案经过修正终于通过。蟠桃园10月1日成立。28日又成立幼稚教育研究会。五天之内通过三个会议的民主协商并果断决定解决这么一个众说纷纭的组织问题,真不容易。这件事说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一个平等相待的关系,其互动过程只有说服而不能压制、控制或者欺骗。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法律权利,甚或自治。只有民主协商,才能体现出民主的真实。在杜威(John Dewey, 1859 ~ 1952) 1927年发表的《公众及其问题》(Public and Its Problems)中就有有关民主协商的论述。杜威是陶行知的老师,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体系的创始人。孙铭勋、戴自俺这个提案本身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提案通过并实施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民主协商(Dewocracy as Public Deliberation)精神,这一次是校内的话语民主。另一次是同年和平学园打水井让附近居民取水用的过程。陶行知称这是生活即教育与社会即学校如何实现的一个实例^②。这是校外的行动民主。不管话语还是行动,不论校内还是

校外,都要实行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陶行知还说,真正的民主必须包涵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②,这更需要协商民主。这是对当代三种主要民主形式:代议民主、多数民主、远程民主(Tele-democracy)的补充和完善。

1927年3月至5月,克伯屈来华意欲访晓庄,那时“正值国内清党,沪宁路线不通,有许多不安的现象,所以不能来到晓庄。”^③1929年10月,克伯屈离开俄国来到中国,专程访问晓庄。克伯屈与陶行知有师生情谊,陶致辞欢迎,他说:

现在世界上能够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指导的怕只有克先生。这不是平常的开会,倒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会;因为先生是我留学时的老师,今天我与师范同学、小朋友,都聚集一堂。这不是四代吗?(大家鼓掌)一家团圆是人生最有趣的生活。^④

这是一次跨越地缘性、业缘性紧密结合的浓郁氛围的家庭聚会。这次业缘性集中表现在对生活教育实践的观察以及理论发展变化的探讨。这也是铭勋同志与生活教育白头偕老相约的终生伴侣。克伯屈关注生活教育纵横两方面,一是人生的起始:幼稚教育;二是社会发展的起始:乡村教育。晓庄就是从这两方面入手办起来的。

关于幼稚教育,克伯屈提出批评:“现在中国的幼稚园,还是在二十五年前的幼稚园。”二十五年前系指蒙台梭利创办幼稚园的时间。“一切活动都是机械的,同是一律的天天在那里拍拍手,走走圆圈,一个教师在那里弹琴……总之,一切活动,都是机械的,千篇一律,万篇一律,一成不变的。”陶回答说:“中国的幼稚园还是在二十五年以前的幼稚园,当然不是今日的幼稚园。……但是,这也才是一小部分。”陶立即带克伯屈到孙铭勋主持的晓庄幼稚

园和戴自俺主持的燕子矶幼稚园参观，在农场上看小朋友所种的东西。克伯屈参观后说：“啊，这些我在外国倒还没有看见过，这是很好的一种办法。”^⑤陶又回答说：“我们一方面在这里干……我们要把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经验都吸收进来，我们来截长补短冶成一炉，来造成一个‘今日之幼稚园’！”^⑥铭勋同志就是这“今日之幼稚园”里一位慈祥的园丁。人们都称他“孙妈妈”。

关于乡村教育，克伯屈特别赞赏，并有很高的期待，他说：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各种事情都在那里变动得很快，所以学校不能沿用以前书本上的知识，要以生活来引导，要实现生活，依照实际生活的方法来实现生活的教育。以中国而论，最多数是农民，世界上变动最受影响的也是农民，所以教育的力量要教农民思想变动，以产生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家庭，以实现理想的生活，领导他们有更好的普通变动。我看这个学校负有特殊的使命。……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⑦

这段话确如陶行知在欢迎词中所说的是“最有价值的指导”。生活教育要首先解决好“生活”与“教育”的关系，着重点要放在乡村教育上。两年前，陶行知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宣示过这些主张。他说：

惟既有国民政治上的革命，同时还须有教育上的革命。……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全部的课程；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抱着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毅然决然的跑到这个荒僻的乡下来。^⑧

陶行知及生活教育者讲的革命,既指政治,也指经济和文化,是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大小变革。革命的焦点始终是极为错综复杂而又反反复复的民主与专制的相互较量。“我们要社会改造,也需要用委婉的精神。”^②“委婉”就是协商民主。生活教育就是指在这种反复较量中,采用协商民主的方法,“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把教育展开到生活所包含之领域,把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教育要办成‘非教育’……‘非教育’实实在在是千真万真的‘真教育’。”^③克伯屈从全球化视野的高度称誉晓庄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而陶行知把教育视为能产生至高无上的力量,他认为今后中华民族的使命,用教育力量建设新中华,用教育的力量叫日本人回到日本去改造日本。^④对于革命,他始终坚持用委婉、和平的方法。

有人希望一个教育者同时应该是一个革命者,陶行知表示同意并补充一句:

一个真正革命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生活教育者。即使他不承认他是一个生活教育者,按着生活教育的理论说来,他也是一个道地的生活教育者。^⑤

应该看到,从事生活教育运动的人虽是少数,但在全社会中却不乏真正的、道地的生活教育者。铭勋同志在从事幼稚教育后,又兼任《乡村教师》的编辑,和方与严一道担当协助陶行知从事理论建树工作。晓庄被封前两个月,已有一本《晓庄学校之理论与实施》正在印刷中。遍寻无着,现在只找到这本书的出版预讯。其中说:“这本书是孙铭勋、戴自俺编辑的。全书四十余万言,插图十余幅。内分三编:第一篇通论……第二篇分论……第三篇考核。凡晓庄理论方面之主张及三年来之实施状况包括无余。”^⑥在十六本晓庄丛书中,孙铭勋以及与戴自俺合作的共四本书,占丛书的四